

THE  
PHOTOGRAPHER'S  
WIFE  
SUZANNE JOINSON

摄  
影  
师  
的  
妻  
子

〔英〕  
苏珊·乔伊森 著  
骆佳圆 译

THE  
PHOTOGRAPHER'S  
WIFE  
SUZANNE JOINSON

摄影  
师妻  
子的

[英]  
苏珊·乔伊森 著  
骆佳圆 译

THE PHOTOGRAPHER'S WIFE by SUZANNE JOINSON  
Copyright © SUZANNE JOINSON, 201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7-37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摄影师的妻子 / [英] 苏珊·乔伊森著；骆佳圆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339-5383-6  
I. ①摄… II. ①苏… ②骆…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9803 号

策划统筹：曹元勇  
责任编辑：王丽荣  
文字编辑：周灵逸  
封面设计：裴峰南  
责任印制：吴春娟

### 摄影师的妻子

[英] 苏珊·乔伊森 著  
骆佳圆 译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hbs.cn](http://www.zjwyh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234 千字  
印张：10  
插页：1  
版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5383-6  
定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献给我的海边拾遗人——伍德罗与斯考特  
献给本

此路无归，得失须远虑

——利奥诺拉·卡林顿，《窃听器》<sup>①</sup>

---

<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

耶路撒冷，1920年

火车上，普鲁对面的男子想把金丝雀放出车窗，动作笨手笨脚。鸟儿扑棱着黄色的翅膀，明亮的黑眼珠露出责备的眼光，随后——呼的一声，飞走了。空荡荡的鸟笼摆在男人面前的桌上。这是一个完美的穹顶鸟笼，为了让小鸟摇荡，佯装飞翔，笼子中央悬着一座小巧的木秋千。普鲁很想伸手摸摸它，却没这个胆量。

尽管他们是火车上仅有的两名欧洲乘客，他却对她毫不在意。乘客中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埃及人和耶路撒冷人，至于余下的人，普鲁一眼分辨不出。她紧紧盯着他，想要赢得他的目光，但未能如愿。车厢里很冷，他却两颊通红，满头大汗。她猜他十有八九是个英国人。车门后的画框里印有如下文字：在巴勒斯坦全境为君提供快捷舒适的旅行设施，连通埃及、叙利亚及无尽之远方。且不论“无尽之远方”究竟是何方，但用“舒适”一词形容这趟火车并不十分恰当，况且，列车已滞留许久。乘务长不知所踪。关门的声音在车厢里隔着老远都能听到。空气凝滞，大家都等着。

年仅十一岁的普鲁这次出行却全凭一己之力。父亲准许她在一日之内往返法斯特酒店与一个名叫“伊布那”的村庄，为一座马穆鲁克塔楼做摄影取材。总的来说，一切顺利。她没有受伤，没遭毒手，没有人和她主动搭话。她那台心爱的伊士曼柯达相机也没被土匪劫走。诚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把她淋得湿寒交迫，好在她已经坐上返程的火车，满心盼望耶路撒冷可以多些温暖和友好。

手提箱的吊牌从男人头顶的行李架上垂下来，她由此得知这个男人从开罗出发，途经亚历山大和坎塔拉。吊牌上的笔迹清晰，油墨乌黑，一看到它，普鲁便推断出了此人的来路。她之前偷听到他对乘务长说自己要去耶路撒冷。那么，他无疑就是那名新来的飞行员了。那位与埃莉诺拉推心置腹的知心好友。火车上没有其他英国人，按计划，这名飞行员现在也差不多该到了。这个秘密的发现给普鲁添了几分勇气，她再次尝试和他进行眼神交流，但他避开了她的目光。曾短暂消失的孤独感重新在她身上停落，一如窗外的暮色。

她看向窗外，火车头上冒出的蒸气逐渐消散，露出漫无边际的石头地和远处山峦若隐若现的轮廓。天穹纯澈而空旷。普鲁还不习惯这里稀疏的草木，她想念山楂花和湿树皮，想念瓢虫、毛茸茸的雏菊花茎和牛蒡叶子。她太想念它们了，这些回忆甚至让她感到恶心。假如她足够勇敢，就应当开口发问：您好，先生，请问您就是爸爸聘来开飞机飞越耶路撒冷的人吗？现在，她看他的眼神仿佛洞穿一切，但刚想开口，男人却突然惊跳到座位后面。

“我的天啊。”他说。窗外，一张脸贴在他座位旁的窗玻璃上，下唇在玻璃上拉得老长，牙床、牙齿全露在外面，但这张脸马上便消失了。应该是什么人摔倒到铁轨上了。窗户上只留下一道口水印子和唾沫星。一瞬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名不知是不是埃莉诺拉朋

友的男人把手指按在玻璃上的那摊污渍旁。车厢里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乘客们纷纷跑去火车头那一侧一探究竟。普鲁也跟了过去，她被挤在英国人的胳膊肘和一名亚美尼亚牧师的手杖之间。

车厢外，身着奇怪制服的士兵在躺在地上的男人身边围成一个圈，他们用宽大的靴子狠狠踢他的肚子。地上的人的头朝火车一侧扭过来，普鲁发现，每当靴子重击在他身上，他的舌头就会在嘴里一伸一缩。她为这个男人的遭遇皱起眉头。亚美尼亚牧师全然无视普鲁的存在，用手杖敲了敲英国人。

“你说，”他问道，“这是在干吗？”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他答，不耐烦地抖了抖裤子，这才终于看见了普鲁。他瞪大眼睛，好像看见身边站了一个英国孩子是多大的稀罕事，虽然她明明一直都站在那儿。

一列队伍进入人们的视野。那是一队套着脚镣的囚犯，他们奄奄一息，蓬头垢面，卑躬屈膝。像这样的人，普鲁还是头一次见。她想，这些应该都是当地村民。清一色的男人。两名士兵把他们往前赶。士兵的制服很不同寻常——狂野西部的配枪腰带，系红丝带的宽檐帽。囚犯们从地上的男人身旁蹒跚而过，他们的肩上扛着什么东西。应该不是十字架吧？这不是一趟朝觐之行，是别的什么。现在，乘务长在普鲁身后的过道上开出一条路，每走一步，都要吹一声口哨。

“是英国宪兵队。”乘务长说，他吹着哨子，呼吸离普鲁很近。“他们逮到了一个非法犯罪团伙，要将他们示众，让大家看清这群人的嘴脸。”他的手在红丝绒的制服马甲上擦了擦，像要把自己弄干净。“但实在没这个必要。我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面目。”

英国人现在势必要和她聊上几句了，他已经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了。说话呀，我就在这里。但他没有开口，而是闭上眼，仿佛要让自己和

时下发生的一切隔绝。一个男人骑着马从衣衫褴褛、步履蹒跚的囚犯身边出现，也同样戴一顶稀奇古怪的、半带官方色彩的帽子。英国人睁开眼，挺直身子，普鲁发现他正凝视着马背上的男人。

囚犯们列队经过时也没有抬头，他们没有看见火车车窗里一张张瞠目结舌的面孔。四个男人把一架梯子扛在肩头，上面绑着一个人。普鲁想那个人一定是死了，否则胳膊和腿不会以那种角度垂挂着。这是她第一次亲眼看到死人。她很想把这一幕抓拍下来。

这场骚动渐渐平息后，英国人拿着包括鸟笼在内的所有行李，一言不发地搬去了另一节车厢。

\*

法斯特酒店派来恭候普鲁的司机是一名上了年纪的英国军人，他叫吉本斯，胸前挂满勋章。

“又来了一个。”他说。他没有让普鲁把背包递来，因为他知道她不会把它交出来。两分钟前，耶路撒冷火车站的站台上还是一片喧嚣：影影绰绰的制服、长袍和硬壳太阳帽、包裹、行李——其中绝大部分是成捆的被单，堆得遍地都是。但一转眼，这些全不见了。现在天光渐暗，普鲁还饿着肚子，她受够了整场历险，为自己竟在马穆鲁克塔上浪费了一整条胶卷悔恨不已：一座光秃秃的塔，四周一片荒芜。司机朝着普鲁身后比手势。她转过身。只见那个英国人慢慢向他们走来，这一次，他终于免不了和她开口交谈。这样，她便有机会证实自己确信无疑的推论。

“你好。”他说，好像半小时前根本没在窗边见过她似的。他的旅行大衣皱皱巴巴。“我是空军上尉威廉·哈林顿。”

“嗯。我在火车上就猜出了你是谁。”普鲁说道。吉本斯拎起箱子，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向蒙尘的克鲁斯利车。

“我叫普鲁登斯·阿什顿。”她说，“你会在我爸爸手下工作。”见他没搭腔，她继续说道：“埃莉诺拉和我提起过你。传说中的捕鸟好手。”

听到这话，这个男人——威廉·哈林顿抖了抖身子，表示满意。

一起坐在后排，意味着两人都得紧紧抓住车门里的把手，才能不至于在颠簸的道路上和对方扑个满怀。

“埃莉诺拉最近可好？”威廉·哈林顿终于说了句话。他明显费了一番努力才能这样礼貌地与她交谈。

“她一切都好。”普鲁答道。她决定不透露更多，借保持神秘来惩罚这个男人。接着，她想捉弄他一番，故意不看他，说：“你肯定知道，她嫁给了那个了不起的摄影师，哈立德·拉苏尔。”

男人清了清嗓子，点点头，没再出声。普鲁看见他凝望着窗外的岩丘裸地飞速变幻为道路两旁的灰色石头房子。他面容憔悴，身形瘦削，她留意到他的一只手始终罩在耳上。来到耶路撒冷对他而言是否具有重大意义？她发现，大多数人都会为光临耶路撒冷赋予象征意味。他们计划已久，早早便开始畅游书海，朝思暮想。他们似乎都对这座城市抱有某种愿景，可真正抵达时却往往恼羞成怒。这里与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不过，对他来说，这趟旅程也许再平凡不过，令人疲惫乏味，历尽险阻。

“你为什么放走那只金丝雀？”她问。他哼了一声，好像对这个问题很不满，叹了口气。“我在开罗市场把它买来送给埃莉诺拉，但突然就觉得它不是件合适的礼物。”

余下的旅途是在沉默中度过的。普鲁从背包里抽出伊赫桑给她的

那张纸，纸上列出了一串字符和对应释义。伊赫桑把这些至关重要的密码托付给她，她打着阿拉伯语课的幌子将它们默记下来。她把这张纸放在身边人看不见的位置，手指划过其中一行字。第一串字母是“alif”，一个不幸的瘦子，简直是在形容这个初来乍到的男人。晚些时候，她会把这个想法用密码写下来。

小轿车终于来了个急刹车。普鲁把纸折好，身子探出窗外。一块写着“考克金船运及旅行代理”的招牌安在法斯特酒店门前，遮阳棚下站着她的父亲，还是那套万年不变的行头，一身白色西装，头戴红色圆顶礼帽，正在驱赶一只在他脸旁飞旋的苍蝇。他身边站着德国来的鲍姆夫人。

“那个人，”普鲁觉得这话保准能让威廉·哈林顿大吃一惊，“是我爸爸的德国情妇。”

“哦。”他说道，睁大眼睛。她扭头朝雅法路尽头望去，看见埃莉诺拉正沿街走来。冬日午后低垂的日光照耀在她的大衣上，软毛尖似有火光燃烧。

“看。”普鲁说，“埃莉诺拉在那儿。”

“法斯特酒店到了。”司机同时说。威廉·哈林顿请普鲁先下车。她向父亲和他的情人挥手，在他们等着迎接新朋友时又向朝他们走来的埃莉诺拉招手。不过，普鲁没有停下脚步，她从他们身边飞奔而过，父亲在她身后喊了几句话，但她没听清，也未加理会，自顾自地继续前行。当她从酒店里回头向外看时，发现他们也已把她忘在脑后。

一

肖勒姆，1937年

门外的男人一副伦敦人的打扮，西装虽皱，但价格不菲，肖勒姆居民从不会穿这样的衣服。当他试着拧动把手时，我从木门的门缝旁退开，屏息站在原地。他的声音轻易地从朽木中透过来。

“皮埃尔·米勒太太？”

哦，你找错人了。我诧异地意识到这个名字竟这么快就被我从记忆中抹去了。我又变回了普鲁登斯·阿什顿。成为皮埃尔太太之前，我曾叫这个名字，从今往后，也将以这个身份继续活下去。听见他拖着步子踩在松散的卵石滩上，我突然想起，这就是事先给我拍过电报的记者。我当时没有回信，喏，他现在亲自登门了。我摸了摸嘴唇，没涂口红；摸摸头，夹着卷发夹的头发藏在头巾里。我强迫自己垂下肩，打开门。他逆光而立，我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能看见一个高个子的不速之客。

“米勒太太，您好。”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擦过我的肩膀，走进我用作画室的渔棚。“准备好接受《伯灵

顿杂志》采访了吗？我的助理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在我身后的茅屋中央，我正为玛戈特的展览创作的主体雕塑的一部分被两根铁路枕木支撑起来：这是一块体积巨大、凹凸不平的马耳他石灰岩，我刚刚把一桶海水浇在这尊损毁的圣像雕塑上，多余的水在木质地板条间的缝隙里积成水洼。我不想让他看到这幅场面。

“不敢苟同。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收到任何确切消息。”

一只海鸥大摇大摆地迎面走来，一张一合的鸟喙像在乞食。海风如往常一样呼啸而过，令人耳聋目盲。

他退后一步，煞有介事地看着手中的资料，翻阅起一本《伯灵顿杂志》，好像这些能说明问题。在他背后，海潮正渐渐退回浑浊的大海。我扫视海岸，搜寻着斯奇普的身影，但没看见他。这个男人的做派像是在说：好了！我从伦敦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该……？他在空中焦虑地挥了一拳。我叹了口气，把羊毛衫裹在身上。

“你可以在门口等我收拾完再进来吗？”

“当然。”

我在他面前关上门，走到石灰岩跟前，将手掌贴上它冰凉潮湿的表面。今天，它格外令人沮丧。几周以来，这块石头终日令我惊惶不安，莫名其妙地神经紧张——玛戈特对我的完工寄予厚望，每天都寄信询问进度，毫不理会我请求她在我准备万全前切勿叨扰的请求。而今天，我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或至少有了起色。我感觉自己还差一点就可以在这一大块令人生畏的石头上运筹帷幄。

我把手指伸进比利的工作靴的后跟里把它扯下来，又脱掉另一只。我喜欢穿着他厚实的靴子在渔棚里走来走去，还有他的袜子。我不介意一个男人的脚和我一样小，还与我同样身高。我套上自己的鞋，拽

下头巾，快速地掰掉卷发夹，甩开头发。

谢谢您的配合，抱歉百忙之中打扰您，真的太感谢了。他想跟紧我，却被鹅卵石和白垩绊得踉踉跄跄。我无视了他的这些客套话，一边招呼他进小屋，一边在想：斯奇普早上穿羊毛衫出门了吗？今天的风可真猖狂啊。

以前的房主将小屋的名字——“塞西莉亚”刻在一块浮木上挂了起来。这块标志饱经狂风吹打，日夜哗啦作响。我应该把它摘下来，但到现在都还没动手。我关上了我们身后的门。喷溅的浪花在窗上拍打，在航标灯的灯光之下，我们懒散凌乱的生活和我作为母亲的懈怠马虎，全都暴露无遗。

“请坐吧。我来泡茶。”我不想表现得太友好，但至少得保持礼貌。我从唯一一把没坏的椅子上清理掉斯奇普吃剩的乌贼鱼骨，把积水桶里的水灌进水壶，好像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坐在我家餐桌旁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他的呼吸很浅，我还能闻到他身上混杂着须后水、烟草以及药品的味道。

“万分感谢。”他又说了一次。

“知道了。是啊，谁会拒绝《伯灵顿杂志》的采访呢。”

他的个子太高，在这小房间里很难伸展，腿也勉强才伸到桌子下面。斯奇普收集的小玩意摊得到处都是：海螺壳、蟹骨、白垩石。海草或海里的腐物一如既往发出恶臭。屋子里的东西都受潮了，我的一副文胸还从垫子下露了出来。“塞西莉亚”以前是一间废弃的火车车厢，如今扩建成一座一居室的临时木屋。屋里的内壁上还能隐隐看见过去车厢墙板上的装饰性的丝绒绸缎。比利——我的房东，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情人——第一次领我看房时，我还觉得这里富有浪漫气息，虽然

我也说不清怎么会冒出这种念头，不过那都是夏天的事了。那时，没有黏腻的红藻发出恶臭，也没有丝毫征兆表明海涌雾会一连数月在低空徘徊。我把文胸掖到垫子下面，看到他正挤出一副表情，假装他很欣赏“塞西莉亚”的古朴，甚至还想夸我在凹凸不平的卵石滩上帮儿子用烂木头盖房子也是个明智之举。

“那我们开始吧？”我想催他抓紧时间。我拂着身上脏兮兮的黄裙子，在他对面一张不稳的椅子上坐下，装作没看见我们面前那碗脱了水的苹果。

“当然，当然。”他在笔记本里用我能看清的字迹写道：1937年10月4日，普鲁登斯·米勒采访手记。

我头一回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他的脖子上生了严重的皮疹或别的皮肤问题。也许是道旧伤疤，每个人都有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和艺术圈的那群人属于同一类人。他们总是对我那不检点的丈夫——皮埃尔百般逢迎。他们全都一个样：无论是画廊老板、评论家、艺术商，还是记者，他们张着小小的鸟喙啄你，等你给他们投食。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皮埃尔的一手安排？他和《柏林顿杂志》的人是不是走得很近？派一个陌生男人假借采访之名让我不得安宁确实像他的作风，而这个男人代表着我决心与之了断的过去的一切。他是展览里形形色色的人群，是伦敦城无休无止的噪音，是那双凑得太近的眼睛，时而出现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山度士唱片二楼的接待室里，时而浮现于苏豪区的海格力斯柱旁。他是拉斯伯恩广场麦束酒吧<sup>①</sup>里摇摇晃晃的吊灯。正是在那里，我在六个酩酊大醉、令人作呕的超现实主义者面前脱掉了衣服。那儿的头牌雪莉也和我们在一起。在场包括皮

---

① 伦敦当时的著名脱衣舞酒吧。

埃尔在内的男人，全部陶醉于眼前的艳景，他们欢呼：好极了！再来一个！皮埃尔那一晚被人蒙上了眼，所以他根本看不见，真是个傻瓜。

“你刚到肖勒姆没多久，我说的对吗？”男人提问。然而，他的神色并不坦诚，也不常直视我的眼睛。

“我来这儿才几个月。”我的喉头发紧。

“我想，乡下的生活很不一样吧？”

“当然。”

他的笔悬在纸上，却一个字也没写。他在椅子上换了姿势。“你目前正在创作的这幅作品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他我的想法一直在变，但这不等于说我还没有定题。作品的标题是一个自行演化的过程。它时而是《楼梯井》，时而叫《螺旋》，有时又更名为《宇宙之轴》。后来，我决定要么彻底拒绝书面化的标题，要么干脆就更文绉绉一些，最后，索性叫它《圣海伦娜和悬挑楼梯》。这件作品还包含一件附属雕塑，题目暂定为《吊人》。我一直在研究人头和吊绳间的角度关系，想精确地还原人被吊挂时的场面，但对此我只字未提。

“我听说这块石灰岩是你从马耳他运过来的。是真的吗？”

“是的。我父亲驻扎在那儿。他安排人把各种毁坏或废弃的圣像送到我这儿来。在马耳他，弃置的圣像雕塑数不胜数。”

“整件事运作起来是不是很麻烦？”

“完全不会。他们只把它们当成船底的压舱物，甚至连钱都不收。不过从朴次茅斯运到这儿来倒是花了我一笔大价钱。这笔钱可以说差点让我破产了。”

“你为什么选择进行雕塑创作？”他像一只试图了解事态的狗，仰着头，竖起耳朵。

“哦，我被偷偷塞进了斯莱德的艺术班。丈夫对我有一定激励作用，不过我很快就开始独立创作。小时候，当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对那些石头着了迷。”我向他粲然一笑，我总能在必要的时候逢场作戏。他的笔记本上依然没有记录任何东西。

他探过身，看着我的眼睛：“你什么时候去的耶路撒冷？”

“十一岁的时候。不过只有短短半年。但那段记忆一直铭记于心。”

“你住在圣城的哪里？”我假装没听见。那种熟悉的感觉再一次爬上心间，我仿佛感到他的手指顺着我的耳根、手腕内侧蠕动，一路伸到我的大腿根……那些我不愿被人触碰的地方。

一串贝壳哗啦啦地敲在玻璃上，我们都吓了一跳。从挤奶凳上勉强能立稳的无线电里传来一阵杂音，旋即又陷入沉睡。男人提出的每个问题都直刺心房。这群狡猾的记者。净问些烦人的问题。去年，一个傲慢的女记者在新伯灵顿美术馆的展览上也向我抛出过类似的尖锐质询。那个时候，超现实主义掀起的轩然大波还未平息，成为全城热议的话题。超现实主义者激怒了所有人：构成主义者们骂声一片，艺术评论家四处搜集伤风败俗的新闻，用以在专栏里捍卫高地，声讨文明的腐朽和艺术的堕落。处于风暴眼的皮埃尔又气又恼，逼我在恩迪尔街上的一座舞台上坐镇，礼堂里阴风阵阵，我又得在媒体面前发声。《每日邮报》称那天的我“令人作呕”。我真不想待在那儿，一个头戴红色邮筒帽的女人无视在场的男人，把所有问题的矛头都指向我。房子是你作品中的常见题材，但它们不是处于半摧毁状态就是一片废墟。它们如同出于某些耻于开口的原因而进行的隐秘创造。这些房子似乎随时会被风卷走。请问这是你在为自己标记领地吗？“可能吧。”（我还能怎么回答？）你在创作“家园”的时候，是否觉得自己像一个在和家具玩耍的小女孩？“或许如此。”所以你是否深陷过